

中国学校的原理

——学校细分的同时必须对学生科学分类

徐林林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 2019年,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先后进入普及化阶段,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高教分类。学校分类、教学改革,都是改的“教”,对“学”的方面没有想法,导致高教分类、普职分流,只能采用行政手段,明显与中国教育传统文化和家长的期望相背离。问题出在中国教师不懂学生、家长们不懂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学生的先天具备什么优势和缺陷,在教育上根本不知道引导孩子避劣育优,补拙扬长。关于人的先天智慧,现在已经有了智商、情商等18个智力概念,但《教育心理学》没有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的先天智能与后天教育的关系。我们普遍认为“教育改变命运”,其实,教育只能挖掘人的潜能,却不能改变人的大脑思维基因,与种的黄瓜收获不到辣椒一样。教育就是“识本能、挖潜能”,认清学生的天赋是教育学的起点,也是高教分类与教学改革的原点。中国人才培养目标再不只是“国家栋梁”,要转向建设“教育雨林”、培育“人才森林”,人才森林中既要有“乔木”、又要有“灌木”,既要有“木本”、“禾本”、又要有“草本”、“藤本”,用“教育雨林”生态,养育“人才森林”,形成相互支撑、可持续的“人才生态”。

关键词: 学校分类;人才稀缺;智力科学;人才森林

高等教育大众化率达到50%以上,就进入高教普及阶段,中国高教,再也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高教分类。市场营销,首先就讲市场细分;企业生产,首先要确定产品名称、品种、型号、标准。而高等教育,也应该细分市场(学校分类),学校需要定位(名称、品种、型号、标准),这应该是常识。

中国高教分类受到中国社会人力资源分类科学与制度性建设的制约,用人单位需求细分与企业要求人才高度专业化、动手能力强的倒逼,以及生产一线技能劳动者长期供给不足的多重压力下,高教终于分成三大类:学术、应用和高职教育。学校分类是科学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主要是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人才市场需求对接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始终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未来几十年,智能社会运行模式没有大致确定下来之前,人才市场需求就定型不了。所以,高教分类只能是大致分类,进一步细分,由专业来完成。

一、古代称之为“贤能人才”,历代王朝都是求贤若渴

贤能人才,即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求贤若渴。

在1999年以前的精英教育学制下,古代选拔官吏制度,在先秦及以前,实行的是“世官制”(贵族世代为官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贤能人才饥渴性稀缺是常态,中国最早“招贤纳士”可追溯到殷商时代,最典型的莫过于先秦招贤获士商鞅,因“商鞅变法”统一六国;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三分天下有其一。

汉武帝(前134年)、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隋朝(220年)、隋朝等都有相关政策,直到科举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新学制诞生(1902年)三年后才结束(光绪31年、公元1905年)科举制度,历时1319年。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贤能人才的基本制度,它是农业社会最先进的选官制,但在数量与种类上满足不了工业社会规模生产的需要。新学制是工业社会人才培养制,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农业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经验,工业社会生产、生活主体是技术。经验以实践为主体,技术以知识为基础。农业社会读书为做官,成为国家的人,管理社会;工业社会读书是为做事,为全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工业社会的学校是普及的大众化教育,既要培养精英人才,更多的是培养大量的有品质、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

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尤其是每一次科学技术发现与发明,带来新的工业革命,新的产生技术,带来学校教学内容的更新,人才培养类别与教学科目增加知识量爆炸式陡升,客观上逼迫学校教学目标由知识传授转变为能力培养,人才评价由知识量的多少,转变为学会学习能力的强弱;人才结构由知识型一种,转变为多类别、专业型人才系统。技术人才迭代效应加速,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劳动岗位大量缺人的呼声不绝于耳,倒逼学校改变与改革,社会整体劳动效率提高速度加快,学校已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变化需要。

二、人是先天与后天的集合,学生的先天我们却不知道

1996年初,出版的一期美国《自然遗传学》杂志,发表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海姆带领的研究小组与以色列赫兹格纪念医院的理查德·艾泼斯坦博士为首的研究小组的报告称:那些富有冒险精神和容易兴奋的人,其大脑中的D4DR基因,比起那些较为冷漠和沉默的人来讲,结构更长。以色列研究小组对124个志愿者、美国对315个志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向被调查者询问了诸如“有时你是否出自兴奋和冲动去干某件事”等问题,并得出结论,D4DR较长的人在追求新奇上,要比D4DR基因较短的人高出一个等级。即使出生才两周的新生儿,若带有较长的这种基因,对外界的事物也会显示出异常的警觉和好奇。这是人类首次把人的性格与基因碱基对联系在一起[1]。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的说法,其科学依据就是以遗传基因为基础的论断。从实践中观察,人与人的确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本源是基因的差别,因为基因的差别,受同等教育的人,其结果存在较大的不同。按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内经》①,据阴阳学说和人体阴阳强弱,把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平和共五种类型。

现代人类社会科学,首次提出这种差别的遗传因素叫“智商”(即“智力商数”的简称),它是法国心理学家,比奈和西蒙1905年提出来的②。1990年耶鲁大学的教务长彼得·萨洛维和心理学教授克里斯·阿吉里斯又提出了“情商”(即“情感智商”的简称)的概念。“智商”和“情商”两大智力商数,在中国影响较大,甚至有“读书靠智商,工作靠情商”的说法。到目前为止,“类智商”

的概念总共有 18 个,除上述 14 个,加智商、情商外,还有两个是中国人近十多年来,发现的新智力项目,而且与教育联系紧密,即“变商”与“动商”。

变商[2],是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柴福洪教授,研究创新人才课题而得到的全新概念。变商(Change quotient),简称 CQ,即变革智力,是“创新人才”独有的灵魂智慧。它是指人的变革、创新智能(中文的“变”,更也——《说文》;变,易也——《小尔雅》;变者,非常也——《白虎通》;一阖一辟谓之变——《易·系辞》)。“变”能透彻概括“变革”与“创新”的含义。“变商”具有先天性,变革商数高的人,才具有创新潜能,才可能培养成具有创新特质的人才。具有创新特质的人才,才有可能培养出超过一般人的创新力,变商不高的人,通过创新教育,也可以提高一定的创新力,但效果甚微。创新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意识;二是创新行为。创新意识与创新行为强烈的人,才可能是具有较高变革力的创新人才。

发现人才,有科学;清晰认定人才,是科学;选择“适教的人”,更是科学。这就是孔老先生“因材施教”论的本质含义,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没有把“材因”当事做(教育心理学),只是改“施教”方法,无异于盲人摸象,乱改一气。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开发个人的潜能,而不能改变人的本能,完整的教育职责就是“识本能、挖潜能”。这个常识性的教育规律,事实上我们都没有遵守,一直在蛮干。

三、高教分类,本质是学校主动匹配学生智能结构分类

“因材施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先搞明白“材”的类别,才能“因材”“施教”,对“材”之“因”没有弄明白之前,改“教”是盲目的“改”,最多也是事倍功半的“改”。

所以,教学改革,应该是在研究清楚学生的智能结构、科学分类,高教与之配套分类之后的事情。认清学生的天赋是教育学的起点,也是高教分类与教学改革的原点。

中国教育的整个“工艺流程”的优化程序搞反了,路子走偏了。

“程序搞反了”的事实,是在学校没有搞清“学情”之前,先改革“教”的模式、方法;人才培养目标是能力,却拼命灌输知识。

中、小学生苦学的结果,是中国基础教育总体质量高,但也收获了普遍存在的厌学心理,后果是高教质量不高。呈现出的人才现状是:高端人才质量低,中、低端技术技能人才稀缺,老百姓的基础文化知识普及率高、质量也高。

精英教育下的高淘汰率是必然的,但延续到教育普及阶段,类似于“穿汉服,座高铁,不合时宜”。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把青少年背诵唐诗宋词,办成全民共鸣的节目,把中国古董式读书方法、聪明人的错误检测办法,推向新的高度,是总台编导的脑子没进入现代的愚蠢引导,倡导教育思想复古。

中国教育,要冲破中华传统教育文化的束缚,与“五四运动”一样,不高举“科学”大旗的确无解。只有基本准确测试出每一个学生各项智力商数,总体分析智能组合结构特征,找到适合接受某类教育模式,避劣育优,补拙扬长,才能基本说服父母和孩子,相对理性、科学、自愿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这种情况下的教育分类、教学改革才有意义。

学生的基因差别(智力结构差异),不能政治化;是真正的个人隐私,不得公之于众。

搞清楚学生的智力结构差异,是尊重大脑的基因遗传科学,是尊重人性基本事实,是为提高教育教学效率,让学生自觉、自愿对号入座,自主就位,不能用行政手段,硬性规定。

高教分类,不能以社会人才需求类别为根据来分,应按人的智力结构大类设置;也不是研究型高校只教理论,职业学校只教技能。而是,所有高校都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校企合作,学校与社会广泛

联系,不同类别的学校教学主攻方向、知识类别不同,联系社会实践的层级、层面不同,面对的社会实践项目不同。

在现有智能项目下,没有科学筛选的情况下,只有智商、情商、变商、动商、魂商等少数几个项目与教育关联度高,大致上也能粗略地推导出不同的高校需要的智能特征。

例如:研究型高教,应招收“高变商,高智商”(注意顺序)的学生就读,而不是高考高分学生就读,因为会考试的学生,高比例的是训练的结果,而不一定是“高智商”,更不会“高变商”的表现。

应用型高教,应该招收的是不同智力结构类别的学生。如商科类高校,需要高智商与相对高情商、高魂商人才;工科类高校,需要高动商与相对高智商、高韧商人才;艺术类高校,需要高动商与相对高情商、高魂商人才;管理类(公务员),需要高情商与相对高智商、高韧商人才等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高变商人才,不宜从事公务员、律师、法官、财务等工作。

技能型高教,应该招收“高动商,适度智商”的学生就读,而不是高考低分学生。

中国的考试和试题设计、试卷考察目标设置能力,是世界一流水平。即使高考制度不变,智力理论与实践研究不到位,只要改变试题设计、试卷目标设计,把测试学生知识、能力目标,结合考察学生智能特征目标,也基本能够考察出学生的主要智力项目强弱和智能特征。高校招生再不以总分为唯一录取依据,而是以某一两个智力特征突出而录取(包括极度偏科学生),就能改变目前的现状,大致上就能向人才精准培养走近一大步。

如不改变中、高考试题测试目标,不做学生智力科学研究,找到合适的测试办法,的确改变不了中国教育“内卷化”、全民诟病也没有办法解决、改变不了教学改革收效甚微的宿命。国家在宏观上不做教育“因材施教”工程,就不能提高人才培养精准度。浪费教育资源,浪费国家教育费用和父母精力,择校费、学区房、小孩失去快乐童年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一流高校只招收高考高分学生,而不是专门招收“高变商、高智商”的学生,科学技术上突破“卡脖子”工程研究的难度就一定要大一些。

在 21 世纪 20 年代,中国基础与高等教育,都实现了普及的条件下,教育需要由几千年来只培养“栋梁”的办学思想,转向建设“教育雨林”、培育“人才森林”理念上来,“人才森林”既要有“乔木”、又要有“灌木”,既要有“木本”、“禾本”、又要有“草本”、“藤本”,用“教育雨林”生态,养育“人才森林”,形成相互支撑、可持续的“人才生态”,履行学校推进社会进步的天然使命。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因材施教”,实现理性读书、理智办学、精准培养。尊重人的先天基因和后天教育两个规律,顺应学生的自然,教学双方各就各位,排除盲目办学、盲目改革,让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不让社会推着学校改变。

参考文献:

[1]李辽,影响性格的基因因素[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8月(增刊)

[2]柴福洪,人类的智能系统——高校自主招生的理论基础[J],社会心理科学,2010年第11-12期,总第P1419-1424.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项目编号:21ZD154名称: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教改课题(项目编号:2022JY111名称:云端红色资源融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

作者简介:徐林林,女,(1980年6月--),湖北黄冈人,哲学硕士,武汉设计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